

翻譯政治學：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漢譯的難題

林精華*

摘 要

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的漢譯，是影響 1910 年代後期以來中國社會走向的重要文化事件。由於受限於蘇俄主流話語對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的規定、中國自身反帝反封建的情勢，使得中國對其翻譯充滿著政治學考量，如斯拉夫派、學院派、後蘇聯的文學批評少有譯介，而對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充滿著熱誠，對現實主義文學批評和理論的積極譯介中有不少誤讀，這種情形在周揚翻譯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學位論文中得到了集中體現。

關鍵詞：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漢譯、誤讀

*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

Politics of Translation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Russia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

Lin, Jing-Hua *

Abstract

Chinese translation of Russia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 was very important cultural event which impacted on social change of China since the end of 1910 years. From 1917 year to 1960 years, Soviet Russian emphasized the social important functions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 under control of official discuss, meanwhile, China stressed the social effect of literary critic in the situation of anti-imperialism and anti-feudalism, so intellectuals translated a large members of texts about theory and resolution of Socialist Realism and monographs which radical realist critics wrote in 19-th century into Chinese. Certainly, Slavophile's literary theory, academic theory about literature, and post-soviet Russian literary criticism, almost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there were much misunderstand in translation of radical realist criticism of literature.

Keywords: Russia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 Chinese translation, misunderstand

* School of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不否認，英文是世界上使用得最廣的語言。然而，中文是世界上使用的人口最多的語言，在使用面和使用人數上僅次於這兩種語言的，則是阿拉伯語和俄文。因而，俄文和漢文之間的互譯，尤其是曾經深刻影響中國的俄漢翻譯，也應該是世界上的重要翻譯話題之一，如蘇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是如何經由翻譯在中國得到傳播，並且這種經由漢譯的俄羅斯文本，被認為就是俄國文化自身的表達，儘管與俄語文本自身不盡相同：這就是說，是漢譯的俄國文本，而非俄語經典文本，影響了 20 世紀中國進程！

論及俄漢翻譯是影響中國進程的要素之一，並非譯者單方面的宏圖大志所為，更是社會潮流使然。19 世紀後期以來中國的最大變化是，中國不再為亞洲之中國，而是走向了世界，梁任公所說的世界之中國迅速成為現實，哪怕進入世界的過程艱難曲折，充滿著痛苦、掙扎。中國的這種變化，不單單是外在的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壓力，更有文化上自我改造的內在動力。借助翻譯外來文化，無論是早期的傳教士漢譯一些歐洲宗教文本、當時流行的一些政治經濟和文化文本，還是稍後經由日文仲介翻譯的歐洲重要文本，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直接翻譯歐美的各領域重要文本，成為中國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也就是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降的中國之變，缺少了翻譯的推動是難以想像的，並且正是有了翻譯的車輪，才是中國得以闊步前行，以至於不僅現代學科在中國的建立、現代社會結構的形成、現代教育制度之確立等無不是與翻譯有關，甚至中國人的日常表達用語、不再用古漢語思維，也和翻譯不無關係。¹這種情形，客觀上符合法國巴黎第三大學哲學系教師拉達·伊凡科波維奇（Rada Lvekovic）《永恆的翻譯》（2002）所說的情形，經由翻譯接受其他意義，就如同在愛情、欲望、性欲中接受對方，互相融合和改變。不過，翻譯在中國的情形實際上遠比這複雜，這種習慣於譯介外來文化的浩浩蕩蕩潮流，還隱藏著深厚

¹ 關於這方面研究，請參見芝加哥大學教授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三聯書店，2001 年）

的翻譯政治學考量，例如何以能改變中國人思維、生活方式、社會制度等任何方面的翻譯，卻沒有在中國鍛造出真正契合西方價值觀的現代性，而且中國借翻譯之仲介，能自如運用現代語言表達和思考，卻沒能被世界廣泛接受，相反，具有世界意識的中國與世界矛盾重重。換句話說，歷經百餘年的漢譯歷程，我們看到，導致這種矛盾，不僅有發達國家自身的殖民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主導性原因，還與中國按他國標準，而非根據中國語言體系去譯介國外文本有關，因為晚清以來的大量翻譯，重建了一套替代中國傳統的知識體系、價值系統。對此「進步」及其後果，直到 20 世紀末才有人開始批評性反思，反思這種以譯介文化替代本土傳統的潮流的複雜效應。²遺憾的是，反思尚未觸及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的漢譯問題。

實際上，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文本之漢譯，也如俄羅斯文學之漢譯那樣，皆充滿著矛盾。自《小說月報》1921 年第 12 卷號外作為「俄國文學研究」特刊開啟真正譯介俄羅斯文學批評文本以來，經由蘇俄官方話語所確定的俄羅斯文學批評文本，開始在中國迅速盛行起來，並影響了中國人的審美表達、替代了傳統的中國古代文論、淹沒了注重文學本體論問題討論的歐洲古典文論和文學批評。這種情形之產生今天看來是難以想像的：一方面中國不僅有著豐富的詩論和詩話、詞論和詞話、小說評點，甚至有《文心雕龍》這種系統化和中國普遍接受的以佛學為基礎的理論性經典，另一方面中國是要向先進國家學習、尋求解決中國的進步思想資源，而包括文學批評和理論在內的歐洲文化顯然要比俄國的要具「進步」得多，——在學科成熟度、表述的清晰度、範式的可操作性等方面遠勝於俄國。由此，中國何以會接受充滿著蘇維埃意識形態訴求和俄羅斯民族主義

² 參見西南聯大畢業生、著名的現代主義詩人、現為北京師範大學外文系教授鄭敏先生系列論文《語言觀念必須革新——重新認識漢語的審美與詩意價值》（《文學評論》1996 年第 4 期）、《中國新詩 80 年的反思》（《文學評論》2002 年第 5 期）、《中國新詩與漢語》（《詩探索》2008 年第 1 期）、《新詩面對的問題》（《文藝研究》2009 年第 3 期）等，對大量的翻譯對現代中國文學發展和審美變革有深刻反思。

情緒的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呢？原因之一便是對俄羅斯文學批評的漢譯是一種受到蘇俄官方話語和中國情勢雙重力量推動的跨文化交際，而且是遠超出文學和文學批評之語境的社會意識形態活動。這種神奇的情形，與翻譯系統理論的創始者霍姆斯（James Holmes）《翻譯研究的名與實》（*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72）所說的情形，有某種程度的契合：翻譯本來就是高度語境化的行為，翻譯學就是社會學的一個部分，即翻譯的社會學。如此一來，具有強大輻射力的俄羅斯文學批評之漢譯的複雜效應，就類似於俄羅斯文學漢譯，成為後蘇聯時代的中國知識界和國際學術界所關心的重要論題之一。³

一、

我們知道，翻譯本是很複雜的跨語際的言語活動，不僅關乎原本在母國的地位、被接受的狀況、被詮釋的深刻性等問題，更涉及在新語境中的再解述、用翻譯語言對原作重新書寫並再判斷等繁難、敏感方面。對俄羅斯文學批評文本的漢譯，一開始就不是學術行為，而是中國知識界為尋求國外思想文化資源，以補缺當時知識界看來中國傳統審美之不足的社會責任表達：洋務運動以降，中國先後積極向西方學習技術、制度、政治，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歐洲帶來了巨大災難，梁啟超等人目睹了大戰後的歐洲慘狀，書寫轟動一時之作《歐洲心影錄》，多番描述中國啟蒙知識份子所仰慕的西方社會及其價值觀之慘敗的具體景象，引發中國知識界對引進西方先進文化之懷疑的浪潮，外加這些在當時中國許多啟蒙知識份子看來屬於「先進的」國家，在巴黎和會上出賣中國利益，而與此同時剛剛成立的蘇維埃政權發佈對中國好感的宣言（哪怕根本沒有兌現），以共同反

³ See Mark Gmsa, *Russian Literature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ree studies*. Boston & Leiden: Brill, 2008.

對西方帝國主義的美麗修辭，折服了中國知識界，這些自然促使一大批進步知識份子，把目光從西方，集體地轉向了蘇俄，包括蘇俄文學批評和理論也由此被大規模譯介。這種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之漢譯，顯然是超越引進「先進」美學文本的翻譯社會學行為，有著很多的政治學考量，如周氏兄弟和田漢、瞿秋白和周揚等都是不同時代著名知識份子，以討論中國現實問題的立場論述俄國文學和理論的意義；1940年代後期到1950年代中國討論俄國文學理論，更是充滿著主流意識形態色彩。因而，經由這些人所譯介的俄國文學理論和批評，遠比奧地利格拉茨（Graz）大學教授沃爾夫（Michaela Wolf）《翻譯的社會維度》（2004）所論的情形複雜，即翻譯現象與權力結構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關聯，權力可以視為翻譯過程中的重要因素，權力作用的物件之一是翻譯政策，翻譯政策體現了政府或相關機構的意志，使翻譯合法化有了正當的程式，從而將作為文化活動的翻譯置於經濟、意識形態和政治等因素的制約之下。而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的漢譯歷史與現實表明，這種漢譯是由1910年代末以來的社會語境所決定，——社會普遍熱衷於反封建主義制度、批判西方帝國主義思想、改革傳統價值觀等，而蘇俄認定的現實主義文學批評和理論，如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皮薩列夫等人的重要文本，普遍高度讚譽那些否定性描寫傳統莊園制度或資本主義變革之弊的文學家及其作品；更有甚者，無產階級文化派和一些贊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蘇俄批評家，有意識從經典作品中強行挖掘出這種否定傳統、反對資本主義改革的意義。而這樣的批評和理論顯然把複雜的俄羅斯文學簡單化了，但是得到了蘇維埃意識形態的認可、支持，並被確定為馬克主義-列寧主義的文學理論和方法。蘇俄文學理論和批評的這種發展情勢，卻意外地和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潮流相吻合，導致中國譯介國外文學理論和批評對蘇俄理論情有獨鍾。

可以說，這種情勢決定了譯介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文本，重要的不

是從文學批評和理論的品質方面考慮選材，對那些從文學內部結構深刻討論文學特徵、個性化探索俄羅斯文學發展規律的唯美主義批評、學院派的學術化討論、形式主義批評家從文本構成方面大膽詮釋經典文本等，反而因它們被蘇俄主流社會對所遮罩、排斥，中國左翼知識界也就相應的回避；而那些從社會學和意識形態功能角度討論文學問題的文字，卻得到了積極譯介。如此情形，使中國譯介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時，缺乏主體性意識，從而使這種譯介和功利主義化的俄羅斯文學漢譯大潮相一致，導致原本注重理論自覺、豐富複雜的俄羅斯文學批評，在漢譯過程中發生了變異——誇大原文本的政治訴求、社會教育功能、意識形態表達等。諸如此類情況，形成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之漢譯的格局。

中國對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的譯介，很長時間難以突破這樣的僵局，即蘇聯把俄國重視文學理論建設的傳統，上升到國家意識形態高度，自然限制了文學批評和理論作為人文學科自由發展、宣導人文精神的自主要求。這就造成中國主要是在吻合蘇聯主流意識形態框架內譯介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實際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被正式運行的同時，蘇聯主流文學發展和文學理論的危機就顯露出來，並且日益加劇；到了 1950 年代中後期解凍思潮出現之後，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爭論隨之產生，一些敏銳的理論家們試圖解決文藝學危機問題，出現了重新認真討論美學、文學理論的嘗試，如布洛夫《藝術中的審美實質》（1956）之審美研究、利哈喬夫（1906-1999）《古羅斯文學中的人》（1963）之風格研究、什克洛夫斯基《藝術散文·思考和談話》（1959）和洛特曼的《結構詩學講義》（1964）之文學文本結構詩學問題的研究、弗裡德連傑爾《俄羅斯現實主義詩學》（1971）之文藝學方法論探討、赫拉普琴科《歷史詩學及其物件》（1974）之歷史詩學研究等等，都是改造蘇聯主流文藝學的創造性成果。其中，1967 年著名學者尤裡·洛特曼就針對科日落夫（В. Кожин）的《結構詩學是否可能？》（《文學問題》1965 年第 6 期）發表了轟動一時的長文

《文藝學應該成為一門科學》(1967)，正面闡釋形式主義-結構主義價值，提出文學研究中的科學方法論問題，認為「辯證法是結構主義方法論基礎」，在文藝學研究的傳統結構中，事實上存在著兩種不同方法—文學研究既可以從社會思想入手，也可從審視其旋律、節奏、結構、風格入手，而結構主義研究則選擇後者，以便解決現代文藝學中的矛盾—文學中的藝術想像、表達社會意識的獨特形式與揭示作為諸種意義因素之統一體的作品理念，以確定藝術文本系統中各因素的意義。⁴但是，1957年之後中國知識界，雖然繼續關注蘇俄變革，卻沒有從蘇俄文學批評和理論的論爭、變革中受益，仍然是延續1920年代以來的譯介傳統。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長期以來中國進步知識界追隨蘇俄的步伐，使俄國現實主義批評和理論、蘇俄左翼和官方文學理論體系（科學院和莫斯科大學的著名學者主編的種種《文學理論》教程），在中國得到了超乎尋常的重視。這就是，蘇聯時代選編的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普羅漢列夫等人文集，悉數得到翻譯。實際上，這些批評家的文本，遠非現實主義批評所能涵蓋的，例如他們普遍有著俄羅斯知識份子對俄羅斯帝國的強烈認同感，用西方啟蒙主義思想解釋俄國變革中所出現的各種社會現實問題的現實性價值、歷史性局限。而這種譯介，一方面導致對俄羅斯文學的認知越來越接受蘇聯官方話語的定位，把東正教信仰和斯拉夫傳統所孜孜以求的道德純潔、審美過程的社會責任化等都視之為共產主義；另一方面，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高爾基、安德列·別雷、科倫泰等經典作家，為了深切揭示俄國在西方啟蒙主義思想影響下進行的資本主義變革所產生的複雜效應—個人覺醒及其帶來的社會倫理代價，在其詩歌和小說中使用了許多複雜、敏感、尖銳的表述，涉及俄國人的性觀念變化、宗教信仰扭曲、心理病態等，這些表述也的確顯示出俄

⁴ Ю.М.Лотман,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 в должно быть наукой.//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7. №1; или 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СПб;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1997, С759-762

國知識份子對社會現實問題的深刻認知、體驗，卻被蘇俄官方讚賞的一些批評家理論家斷然回避，即使有些批評家觸及了這些表述，如羅贊諾夫《宗教大法官傳奇》，又被蘇俄官方禁止討論。而中國在急需思想解放的洪流中，卻因為主要是譯介那些現實主義批評家理論家的啟蒙性文本，就很難譯介深入論述人性解放、複雜的俄羅斯文本。不否認，這種有意識回避譯介深入討論性解放、信仰危機和心靈扭曲等問題的文本的現象，在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先後出現過，如 1886 年 John Payne 英譯義大利文藝復興作家薄伽丘宣導人性解放的《十日談》，雖是完整譯本，卻把對英國讀者而言可能會引發「淫蕩」聯想的一些語句翻譯成中世紀法語，在再版本（1893）中又還原其義大利文，就是不翻譯成當時的英文；同樣，1903 年 J.M.Rigg 英譯《十日談》時，也把那些所謂「淫穢」的文字保留在義大利文狀態（1921、1930 年再版時仍如此）。而這樣的翻譯並非譯者語言能力欠缺，或者翻譯態度不嚴肅，而是英國人的道德規範之約束的結果。對此，E.Stuart Bates《現代翻譯》（1936）甚至讚賞這種偏離原文的翻譯行為，說是此舉避免了有可能引起的道德危機。此外，俄國許多民間文學批評家，因為自身的學識不足、外語能力不夠，多借用西方啟蒙主義思想討論俄羅斯文學現象，因而有不少知識性誤讀、歷史局限，如別林斯基很有預見性地指出普希金創作之於俄羅斯文學的開創性意義，但普希金這位很有學識的作家，1836 年 4 月 23 日卻致信友人如是描述別林斯基，「假如他能夠在保持獨立見解和敏銳力的同時，多學習、多讀書、更尊重傳統、更謹慎，簡而言之，假如他更成熟一些，我們或許就把他看成一位真正佼佼不群的批評家」。⁵然而，大凡別林斯基的論文，無論是否有這樣的不足，都得到中國知識界的積極譯介；與之類似，對這些激進的現實主義批評家曲解或隱去俄羅斯文學中關於人性、東正教和心理病態的敘述，中國幾乎沒有專業學

⁵ Пушкин о литературе. СПб.: Мнение М.Лобанова, 1936, С.86

者去指正。

在譯介俄羅斯文本過程中，特別凸顯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的現實主義功能之同時，中國知識界又對文學批評中的東方基督教意識有意識遮罩之。其中，許多傑出的俄羅斯文學家分別發表了深刻認識俄國身份、社會變革方向、知識份子使命、文學走向等問題的文化批評論著，如梅列日科夫斯基用現代性視野透視俄國文學和文化的《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1901-1902）和《果戈理與魔鬼》（1906）等理論力作、《基督與反基督者》等文學巨作，別爾嘉耶夫等七位著名知識份子的《路標文集》（1909）和他本人討論俄羅斯民族性的《俄羅斯命運》（1915），安德列·別雷的《關於知識份子的真理》（1909）、《革命與文化》（1917）、《文化危機》（1920）和《文化之路》（1921）等理論篇章和其《彼得報》、《莫斯科》、《入了基督教的中國人》等文學巨作，普列漢諾夫之《托爾斯泰與自然》，勃洛克之《俄羅斯的太陽》（1908）和《果戈理的孩子》（1909）等經典的批評文本，因為有著明顯的東方基督教意識和現代主義痕跡，當時常被中國知識界所提及，卻只是到了 1990 年代才開始被漢譯。

在這種格局中，對安年科夫、霍米亞科夫、阿克薩科夫等著名斯拉夫派知識份子，以及恩格爾哈特、維謝洛夫斯基等 19-20 世紀之交學院派知識份子的文學批評和理論，因為不是啟蒙主義式的討論俄羅斯問題，就沒有得到中國知識界的譯介。這些人先後著述了影響俄國文學批評走向的文學史和文學理論之作，諸如歷史文化學派代表人物吉洪拉沃夫（1832—1893）《俄國文學史和古代文化編年史》（1895）和佩平（1833-1904）《俄國文學史》（1898-1899）、心理學派代表奧夫相尼科-庫尼科夫斯基（1853-1920）5 卷本《19 世紀俄國文學史》（1910-1911）和《俄國知識份子歷史》、波捷勃尼亞（1835-1911）《思想與語言》等，以及尼古拉·恩格爾哈特的兩卷本《19 世紀俄國文學史》（1913）、E.丹尼奇科夫等人合作的 4 卷本《俄國文學史》（1908）、A.斯卡彼且夫斯基那在 19-20 世紀之交

連續再版 7 次的《當代俄國文學史，1848-1908》等，這些關注俄國民族文化特性和理想性特點的著述，深刻顯示出俄國知識界所達到的思想水準和學術深度，原本是特別需要關注的，茅盾等人在 1920 年代也發現了部分著作，⁶但迄今為止少有人認真對待這類文獻，更遑論譯介了。不僅如此，俄國比較文學之父維謝洛夫斯基那很有學術指導意義和方法論價值的之作《歷史詩學》，打破了自亞裡斯多德以來西方詩學標準的傳統，不再僅僅是依據西方古典文學範本推導出文學創作規則和文學評價模式，不用既定的詩學去規範讀者的審美趣味，而是回到歷史語境中查考不同文學母題或文體的起源和演變，在廣泛比較分析各民族文學具體發展過程中，切實揭示文學藝術發展的規律，從文學的歷史發展中闡明其本質，並在這個基礎上對情節詩學、詩歌語言、文本結構等一系列具體問題，展開學理性研究，在文藝學與文化史之間建立起來了聯繫，使文學研究獲得了紮實的歷史文化基礎和意義。但是，如此重要研究，只是到 2003 年才由劉甯教授翻譯過來（百花文藝出版社）；即便如此，也未產生西方文學理論那樣的轟動效應。

還有，聲勢浩大的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之漢譯潮流，卻不去譯介那些重視文學技術性問題的批評、理論文獻，哪怕這些文獻有意識用純粹詩學理論去抵抗負荷了過重意識形態的正統文學觀念，因而之於俄國和世界的文學批評和理論發展史是極其珍貴的。這些文本包括勃捷波尼亞《思想和語言》（1862）與《關於語言藝術理論筆記和講座》（1892）、維謝洛夫斯基《詩歌語言和散文語言》（1898）、溫諾格拉多夫《論詩歌語言的理論體系》（1927）、維諾庫爾 Г.О.《關於文學作品的語言研究》（1945）、什克洛夫斯基《作為情節的藝術》、日爾蒙斯基《論形式方法問題》（1923）和梯尼亞諾夫《論文學的進化》（1927）等，它們顯示出俄羅斯知識份子

⁶ 參見郎損（茅盾）：《陀思妥以夫斯基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小說月報》第 13 卷第 1 號，1922 年 1 月）。

認識文學內部規律問題的深度（後蘇聯俄國學界重建文學批評和理論，特別推崇這些文本，如莫斯科大學出版社推出的語言文學系教材《俄羅斯語言藝術：從語言藝術理論到文本結構（文選）》，主要是收錄這些文本）。然而，就因為它們不是討論文學的社會學問題，至今也被中國譯介得有限。

也正是在這種譯介的情勢中，巴赫金及其《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問題》（1929）的蘇俄再發現（1963年出版修訂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盧那察爾斯基、維諾格納多夫等著名人士對此發表有書評，1979年已是著名學者的米哈伊爾·蓋斯帕諾夫發表《20世紀俄國文化中的巴赫金》，論述這位理論家對蘇俄思想解放的意義，討論他對解決蘇聯或者虛無主義的否定主流意識形態，或者盲目服膺於主流意識形態之困境問題的作用），⁷發現巴赫金的意義不僅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專家，還是「要比形式主義長半輩，後者是未來主義時期的理論家，而他是象徵主義時期思想家。他提出的問題與俄國哲學的『世界神學』傳統息息相關，中心問題是人文主義。」⁸因而，隨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等大批著作逐漸被認可，這就促使蘇聯人進一步意識到蘇聯人文學科危機的嚴重性、需要改造的緊迫性。但是，中國直到1988年才有譯本：而且不是經由對蘇聯文學批評的再閱讀而發現的，而是錢鐘書先生從西方譯介巴赫金中看到的，而後推薦錢中文先生去介紹，白春仁教授和顧亞鈴教授才去翻譯。正因為這樣對待巴赫金，所以哪怕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就出版了《巴赫金全集》，只是引發中國學界普遍採用巴赫金思想、研究巴赫金，並未提升中國知識界重新系統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問題。

這樣的譯介格局，沒有因為蘇聯解體，出現根本性的改觀。後蘇聯俄

⁷ Ред. Ю. Лотмана, *Вторичные межделирующие системы*. Тарту: Тарту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79, С.113

⁸ Седакова, М. *Бахтин-еще с одной* // Новый Круш(1)1992, С.117

國在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探討上卓有成效，出現了一系列重要批評家理論家及其文本，包括列夫·安寧斯基（Лев Аннинский, 1934-）《我的世紀，我的野獸：俄羅斯、蘇聯和世界的詩歌證明》（2004）、《戀愛約會中的俄羅斯人》（2004）、《紅色世紀。銀色和黑色。銅管子》（2004）、《我們需要怎樣的俄國》（2007）等，邦達連科（Владимир Бондаренко, 1942-）《知識份子的崩潰》（1995）、《現實的文學：20位俄國優秀作家》（1996）、《俄羅斯——語言國度》（1996）、《文學日》（1997）、《狂熱的反動分子：俄羅斯愛國主義的三幅面孔》（2003）、《平民的白銀時代》（2004）、《帝國的最後一批詩人：文學命運概論》（2005）、《很難成為俄羅斯人》（2007）、《俄羅斯帝國的歌手》（2007）和《孤獨的一代》（2008）等，娜達麗雅·伊凡諾娃（Наталья Иванова, 1945-）《對後現代主義之克服》（1998）、《蘇維埃文化總結》（2001）、《俄國為何選擇普京：不只是文學情勢的當代語境中的亞歷山卓·瑪麗尼娜》（2002）、《新宣傳：左邊設置和右邊風景》（2003）、《文學的保留地：投入一盧布就產出兩盧布》（2005）、《這種批評誰還需要？》（2005）、《極端小說，或俄羅斯語言藝術的幻想可能性》（2006）、《逃脫當代。20-21世紀俄羅斯文學：從不完整到後蘇聯，而現在是全世界的》（2007）、《作家與政治》（2008）、《艱難的十年》（2010）等，愛潑斯坦（М.Эпштейн, 1950-）《未來之後：論文學的新意識》（1991）、《俄國後現代主義的起源和意義》（1996）、《回應：“後—”和“超越”、俄國批評理論和後現代主義》（1995）、《俄國文學和文化中的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1996）、《20世紀文化中的“超”：從現代主義轉向後現代主義的辯證法》（1996）、《後現代主義的初始或終結》（1996）、《後現代主義與共產主義》（1996）、《世紀之初，或者從後到初。新世紀宣言》（2001）等，杜波連科（Евгений Добренко, 1962-）及其《權力隱喻》（1993）、《蘇聯讀者的形成：蘇聯文學之形成的社會與美學前提》（1997）、《蘇聯作家的形成：蘇聯文學的社會和美學起源》（1999）、《社會現實主義的政治經濟學》

(2007)、《烹飪共產主義：美味與健康》(2009)等，這些篇章不僅有效解釋了後蘇聯文學發展、後蘇聯俄國人對蘇聯文化再反思等問題，而且也顯示出後蘇聯批評家認識當代俄羅斯文學、蘇聯文學的深度。但是，它們幾乎完全沒有被漢譯，原因很簡單—如同中國大陸社會近 30 年來改革開放更多是在學習西方尤其是美國模式那樣，中國大陸批評界則熱情擁抱西方文學批評理論，看不到俄國、印度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文學理論變革。殊不知，對同為轉型國家的當代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的忽視，可能使我們失去觀照西方批評和理論的參照系，而不僅僅是會影響對後蘇聯文學發展的深入認識。

可見，漢譯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基本上不是學術行為，而是受限於中國把文學批評和理論視為借助外來資源去認識和解決中國現代問題的方式之一，並且在放棄傳統中國詩學資源的同時，中國批評界和文學理論界在 1910 年代末-1950 年代熱衷於譯介蘇俄官方話語，1980 年代以來追逐世界主流話語等，從而使俄國大多數重要的文學批評和理論文本無法及時被譯介。這種翻譯的矛盾性，遠比瓦爾特·本雅明《譯者的任務》(1923)所聲稱的情形複雜，「一部作品是否可譯的問題有雙重意義。或是能否在作品的總體閱讀中找到勝任的譯者？或更確切地說，其本質是否適合翻譯，僅就這種形式的意義而言而要求翻譯？原則上，第一個問題只能是偶然地斷定，第二個問題則是邏輯上確證。只有膚淺的思考才會否認後一個問題的獨立意義，並聲稱二者具有相同的意義」，不同語言間有或多或少的親緣性，它們所論述的論題相互關聯，「譯文所表明的語言之親緣性，要比兩部文學作品的表面和難以定義的雷同所表明的要深刻和清楚得多。要掌握原文和譯文之間的關係問題，是需要研究是，這種研究的意圖類似於認識批判皆以證明模仿理論之不可能性的那種論點」，翻譯包含著討論，討論或許會成為某種反諷，「可譯性本質上屬於某些作品—不是說其譯文對它們而言必不可少，而是說，存在於原文中的某種意義在其可譯

性中的自行表現」。⁹而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文本之漢譯的困局，並非中國沒有譯介者意識到那些特別體現俄羅斯性的文本需要翻譯，也不是沒有學者缺乏相應的譯介能力去翻譯，而是因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情勢所迫，譯介者難以保持學者的中立態度，不能把譯介視為專業行為，而是更看重俄羅斯文學批評理論文本中直接的社會責任訴求，不顧及其他品質，雖然取得了某種時效，卻影響了整體接受俄羅斯文學批評的效益，進一步限定了中國人對文學在俄國發展之實際狀況的認知，更限制了中國人對文學的自由閱讀、認知。很顯然，這種情形，並非具體譯者的疏失所為，而是期間中國「進步」知識界多相信蘇俄官方意識形態定位俄羅斯文學批評表達、理論表述，而非他們自己對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的發現、體悟；進而，對這種實際上偏離了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本體的翻譯，知識界長時間津津樂道於其中，看不到這種翻譯本身的問題，甚至習慣於這樣的誤譯，也就理所應當了。

二、

對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的譯介，因為翻譯的政治學原因，不僅造成這種結構上的失衡，而且具體影響到翻譯的過程，導致最具特色的變形不單在選材和詮釋上建構了和中國傳統詩學相衝突的蘇俄文學批評理論，而且在對具體譯介過程上進一步強化蘇俄理論的社會意識形態性，淡化其對文學內在規律的探討。實際上，對俄羅斯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翻譯，與文學作品的翻譯一樣，「真」都是必須的，不「真」則意味著對原本的理論和批評之翻譯的有誤，而「真」可能也是最好地傳達了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美」是翻譯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的重要條件，因為經典的俄

⁹ 陳永國主編：《翻譯與後現代性》，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6頁。

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文本，哪怕不是出自文學名家，也是很有文學修養的知識份子用散文的筆觸書寫出的，從第一個職業批評家別林斯基的經典篇章，到白銀時代大批文化型文學批評家的論述、蘇聯和後蘇聯時代一些重要論著，無不顯示出，這些批評和理論文字很有美文風範、哲學韻味，因而追求把的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文本翻譯得「真」而「美」是必須的。

然而，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之現代漢譯，最有影響力的當屬周揚譯車爾尼雪夫斯基《藝術對現實的審美關係》（大連讀書出版社 1948 年 2 月初版）。但是，譯作既失去「真」又去了不少原作的「美」，還有著許多誤讀，但因為它傳達的「美是生活」術語作為最重要的唯物主義美學概念，與主流意識形態相吻合，在中國得到了最為廣泛的引用、實踐。而這個術語是和這段話聯繫在一起的，即「在人所寶貴的一切東西中，他所最寶貴的是生活；第一寶貴是他所願意過，如他所愛的那樣一種生活；其次是一切的生活，因為生活到底比不活好；但凡活的東西在本性上就恐懼死亡，恐懼不存在，而愛生活。『美是生活』、『任何東西』，我們在那裡面看得見照我們的概念應當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東西，凡是獨自表現生活或使人憶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¹⁰問題是這段被廣泛援引的話，就現代漢語句法和修辭而言多有似是而非、含混不清：這究竟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原文表述的本然，還是周揚翻譯使然？若是原作的問題，何以在俄國有如此巨大影響力？若是周揚翻譯問題，大半個世紀以來，這樣的譯文何以如此深入人心？

這段譯文在原作中也是很著名的：“Самое общее из того, что мило человеку, и самое милое ему на свете--жизнь; ближайшим образом такая жизнь, какую хотелось бы ему вести, какую любит он; потом и всякая жизнь, потому что все-таки лучше жить, чем не жить: все живое уже по

¹⁰ 車爾尼舍夫斯基著、周揚譯：《生活與美學》，大連光華書店，1948 年，第 7 頁。

самой природе своей ужасается погибели, небытия и любит жизнь. И кажется, что определение: «прекрасное есть жизнь» прекрасно то существо, в котором видим мы жизнь такую, какова должна быть она по нашим понятиям; прекрасен тот предмет, который выказывает в себе жизнь или напоминает нам о жизни”。¹¹周揚的譯文不是來自這段俄文。據周揚的譯後記，該譯本是根據柯甘（S.D.Kogan）的英譯本（英文版《國際文學》1935年第6-10號）所譯的，包括把書名改為《生活與美學》、正文加上一些小標題，並標注這個譯者乃蘇聯著名翻譯家。然而，參考蘇聯的英譯本發現這段話是這樣表述的，“the most general thing that is dear to a man, than which there is nothing dearer in the world, is life; first, the life a man would like to lead, the life he loves, and then, any life; for, after all, it is better to be alive than dead: by their very nature, all living things have a horror of death, of nonexistence; they love life. And it seems to us that the definition: 'Beauty is life'; 'beautiful is that being in which we see life as it should be according to our conceptions; beautiful is the object which expresses life, or reminds us of life’”；緊接著這段英文本的譯文是分析生活方式的不同如何帶來生命力的差別，從而造成不同的審美觀，“Let us trace the chief manifestations of beauty in different spheres of reality in order to test it. Among the common people, the ‘good life’, ‘life as it should be’, means having enough to eat, living in a good house, having enough sleep;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peasant’s conception of life always contains the concept-work: it is impossible to live without work; indeed, life would be dull without it”。¹²

¹¹ Ченьшевский Н.Г.,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Сот. и вступит. статья А. Ланщикова), М.: «Сов. Россия», 1978, С.31.

¹² N.G. Chernyshevsky, Selected Philosophical Essay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3, p286-288.該譯本根據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輯、國家政治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車爾尼雪夫斯基《哲學選集》譯出的。

無論是俄文прекрасное есть жизнь，還是英文Beauty is life，似乎都不僅僅是「美是生活」。

的確如此，作為美學家車爾尼雪夫斯基深受費爾巴哈的人類學理論影響—在本質上他和費爾巴哈一樣，也是強調人的生命的重要性的。¹³這種意識，在這篇學位論文中也能顯示出來，如另一著名段落(«хорошая жизнь», «жизнь, как она должна быть», у простого народа состоит в том, чтобы сытно есть, жить в хорошей избе, спать вдоволь; но) вместе с этим у поселянина в понятии «жизнь» всегда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понятие в работе: жить без работы нельзя; да и скучно было бы. Следствием жизни в довольстве при большой работе, не доходящей, однако, до изнурения сил, у молодого псеянина или сельской девушки будет чрезвычайно свежий цвет лица и румянец во всю щеку-- первое условие красоты по простонародным понятиям. Работая много, поэтому будучи крепка сложением, сельская девушка при сытной пище будет довольно плотна, это также необходимое условие красавицы сельской; светская «полувоздушная» касавица кажется поселяницу решительно «невзрачною»..... (強調身份、地位、工作、生活方式等差別，帶來人的生命力各有區別，導致美的情形各不相同)，無不是強調生命活力的重要性—不是說生活的美好。

查著名的С.奧熱科夫主編的《俄語詳解詞典》「жизнь」詞條包括六個義項：1, 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явлений, происходящих в организмах, особая

¹³ 車爾尼雪夫斯基在這篇學位論文三版序言中明確陳述該文「是第一個應用費爾巴哈的思想來解決美學基本問題的嘗試」。據朱光潛先生所論，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哲學中的人類學原理》(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ринцип в философии) 接受了費爾巴哈的人類學原理，而費爾巴哈的人類學原理主要是從生理學來看待人及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社會性的人也還是當作動物性的人看待的(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下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562-563頁)。

форма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материи(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жизни на земле. Жизнь вселенной). 2, Физиологическо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человека, животного всего живого(Дать ж. кому. Вопрос жизни и смерти). 3, время тако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от его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до конца, а также в какой-н. его период(долгая ж.). 4,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общества и человека в тех или иных её проявлениях(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ж., семейная ж.). 5, Реальна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войти в ж.). 6, Оживление, проявлени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энергии(улицы полны ж.),¹⁴即這六個義項分別著眼於「存在」、「人的生命」、「生平」或「生涯」、「生活」、「現實」、「生命力」或「生機」等。

而詞典上的這些知識，是具有詞源學根據的。據俄國著名的古羅斯文化史專家科列索夫（В. Колесов）對「жизнь」詞源義的研究，「凡與活的生物或有機體，首先是與人的任何存在聯繫在一起的一切，在斯拉夫語中一律用詞根жи來標識。這個古老的詞根源於印歐語時代（gi），жи乃其斯拉夫語的形式：在我們時代初期，根據斯拉夫語硬化規則，更為古老的г替代жи。Жизнь的表現是各種各樣、無可計數的，在自己的意識中，人首先把他們固定在一些範圍明確的支點上，當然，這些支點是由其思想水準確定的。把一個古老尾碼附在詞根上，逐漸形成了一些新的獨立詞，這些詞在集體意識中使一些不斷變化基本特點得到了穩固，形成了生生不息過程的最初看法」，並舉例жила вена для обозначения силы жизни: по вене течет кровь дарительница жизни, без крови нет жизнь。¹⁵這也就意味著，生命作為жизнь的基本義項，是俄語發展史所形成的。

1970 年代受業於洛特曼、1980 年代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柏

¹⁴ С.Н.Ожегов, Н.Ю.Шведова,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4-е изд.). М.:Азбуковник,1999, С.194.

¹⁵ В.Колесов, Древняя Русь: Наследие в слове. Мир человека (古羅斯：文字中的遺產、人的世界)。СПб.: Филолог. Фак. СПбГУ, 2000, С.75.

克萊校區成長起來的帕佩爾諾 (Irina Paperno) 教授，其力作《車爾尼雪夫斯基與現實主義時代：關於行為的符號學研究》(Chernyshevsky and the Age of Realism: A Study in the Semiotics of Behavior, 1988) 的最終結論是這樣的，即「車爾尼雪夫斯基把藝術視為建構現實的完整手段，看作解決人之存在的主要問題的生命教科書 (учебник жизни, позволяющий разрешить гла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他不僅研究了詳細敘述這種理念的藝術理論，而且創造了能有助於現代人借此掌控現實及改造現實的藝術作品」。¹⁶

由此，這段話應該譯成「對任何人而言，在他活著的時候，沒有什麼比生命給為寶貴了。首先，人人都願意按著他所希望和所喜歡的那種方式生活；其次，任何類型的生存機會都同樣寶貴，因為無論如何活著終究比不活著要好；但凡生物，就其本性而言，總是恐懼死亡、害怕生命不復存在並且熱愛生命的。這樣一來，似乎就可以下定義了：『美是生命』；『美是一種存在，我們從中能看得見生命，並且是按照我們的理念應當如此的那種生命；美是這樣一種事物，它自身就顯現或提示生命』。」由此便可以說，上文所引的周揚的譯文是有誤的，他後來便有所修正，但他仍然譯成「有人覺得可愛的一切東西中最有一般性的，他覺得世界上最可愛的就是生活；首先是他所願意過、他所喜歡的那種生活；其次，是任何一種生活，因為活著到底比不活好；但凡活的東西在本性上就恐懼死亡，恐懼不存在，而愛生活。所以，這樣一個定義：『美是生活』；任何事物，凡是我們在那裡面看得見依照我們的理解應當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東西，凡是顯示出生活或使我們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¹⁷

周揚這種問題多多的翻譯，遠沒有達到朱光潛先生《談翻譯》所說的

¹⁶ Ирина Паперно, Семиотика поведения: Николай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человек эпохи реализма. М. НЛЮ, 1998, С.184.

¹⁷ 《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上卷)，北京三聯書店，1958年，第6頁。

狀態—「依我看，直譯和意譯的分別根本不應存在。忠實的翻譯必定能儘量表達原文的意思。思想感情與語言是一致的，相隨而變的，一個意思只有一個精確的說法，換一個說法，意味就完全不同。所以想儘量表達原文的意思，必須儘量保存原文的語句組織。因此，直譯不能不是意譯，而意譯也不能不是直譯。不過同時我們也要顧到中西文的習慣不同，在儘量保存原文的意蘊與風格之中，譯文仍應是讀得順口的中文。以相當的中國語文習慣代替西文語句習慣，而能儘量表達原文的意蘊，這也並無害於『直』。總之，好的翻譯是文從字順的直譯」，與周揚本人理解俄國文學理論的觀點是息息相關的，按他《唯物主義的美學——介紹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學》（《解放日報》1942年4月16日），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一個社會主義和革命民主主義活動家，進而稱其學位論文和「其他哲學著作一樣，表現了革命的和唯物主義的傾向。他把唯物主義的結論應用到藝術的特殊領域。這是一本具有尖銳的、戰鬥的、論辯的特色的著作，它是對唯心主義美學的一個大膽挑戰，是建立唯物主義美學的第一個光輝的貢獻」，「『美是生活』這就是他在美學上的有名公式」，並引述了後來與上述譯文完全一致的段落作為原作者本人的思想，如此之論分別作為1948年初版本、1957年再版本的譯後記（易名為《關於車爾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學》）再次刊出，所以周揚會把“что прекрасное в природе имеет значение прекрасного только как намек на человек”（原文第35頁）這樣的句子譯成「自然界的美的生活，只有作為對人的一種暗示才有美的意義」（漢譯第10頁），如果聯繫上一句話“красоту в природе составляет то, что напоминает человека”，我們就應該把它改成「自然界的美在於提醒人注意到，自然界之美只有對人有暗示時才会有美的意義」。儘管朱光潛先生指出жизнь兼有「生活」和「生命」兩個意義（很遺憾沒指出翻譯上的原

因，而把責任推及車氏本人，說原作者沒有區別這兩種不同的意義），¹⁸而錢中文的《“認識論美學”思想體系》（《文學評論》1986年第3期）在評述蔡儀主編的《美學原理》時則明確指出了周揚這個譯本問題（說жизнь在原作者那兒應該有「生活」、「生命」和「生命力」三個不同層次的意義），1999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其《文學理論：走向交往對話的時代》又收錄這篇書評（第94-104頁），但是事情誠如朱光潛所說，「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藝術對現實的審美關係》（1855）在我國解放前是最早的也幾乎是唯一的翻譯過來的一部完整的西方美學專著，在美學界已成為一部家喻戶曉的書。它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很多人都是通過這部書才對美學發生興趣的，並且形成他們的美學觀點，所以它對我國美學思想的發展有難以測量的影響」。¹⁹這種誤讀性譯語因為始終沒有得到修正，繼續成為「唯物主義美學」的主要根據所在，這段名言及從中引出的藝術乃「生活的教科書」、「再現生活」、「判斷生活」、「改造生活」等常常被中國學界用來作為豐富唯物主義美學的原則。

實際上，「美是生活」在俄國審美觀念中也是存在的，但並非是現實主義潮流所致，相反，現實主義審美觀是試圖通過文學藝術改造生活，用居高臨下的視野俯視社會現實，批判性對待現實問題。而19-20世紀之交的現代主義潮流為了矯正生活過於重視物質的庸俗化現象氾濫，試圖讓文學藝術回到現實生活，提出「藝術即生活」主張，而且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婦、別雷、勃洛克等人身體力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這樣的理想，把生活當作藝術。雖然蘇維埃政權中斷了現代主義藝術潮流，卻用共產主義理想把現實生活和藝術連接在一起，導致蘇維埃主流藝術和非主流藝術都追

¹⁸ 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下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1985年第11次印刷，第563—564、575頁。

¹⁹ 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下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1985年第11次印刷，第559頁。

求「美即生活」。但周揚的翻譯與這些是沒有關係的。對此等令人疑惑的現象，意裔美國坦普爾大學教授韋努蒂（Lawrence Venuti）《幽默文學的翻譯：對等、補償、話語》的下面論述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之，「語言不同、表意方法各異，譯作無法重現原作的表意過程。翻譯總會在各層面上造成原作的損失：形式和意義、句法和語彙、聲效和韻律、典故和互文性等都會有所損失。同時，翻譯也出現了另外的『得』，因為翻譯根本就是語境的重建，就是構建了另一個文本。通過用另一個不同結構和文學傳統的語言改寫原作，翻譯為之添加性的形式和語義特徵。不同語言的句法和詞彙不同，有時差別甚大……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總會造成某種語言和文化上的『得』。這種『得』逾越了原文，產生了譯語文化獨有的意義，再現了本土的文學形式、文學傳統、價值觀念」。²⁰周揚對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的誤譯，也產生了文學翻譯的神奇魅力。

當然，因為譯介俄國文學批評和理論有很多政治學考慮，導致翻譯過程中譯介者經常無法按俄國原文本理解重要文學現象、文學批評術語、文學理論概念等，絕非僅限於周揚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碩士學位論文的翻譯（我們應該充分肯定周揚先生有很好的英語功底，如《安娜卡列尼娜》的最重要漢譯本就出自周揚之手）。1830年代，官方批評家布林加林，敏銳看到文壇上出現果戈理等一批新作家，他們缺乏普希金的文學修養、語言功底，卻滿足了有越來越多的文化水準不高的人成為讀者，但難以領略普希金詩文之優美的趨勢，用沒有詩意的簡單文字，直接書寫俄國現實生活中一些愚昧、落後的現象，違背普希金的文學審美性，被批評為「原始落後派（*натуральная школа*）」；作為啟蒙主義批評家的別林斯基，從反面使用這一術語，認為俄國現實本來就是落後的，需要用相應的白描手法，不加修飾的敘述出來，這是很很有價值的「原始落後派」。然而，中國譯者卻

²⁰ 辜正坤、史忠義主編：《國際翻譯學新探》，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第168-169頁。

按字面義項直譯成「自然派」，至今沒有改觀。

總之，漢譯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中的政治學計算，直接影響了現代中國譯介俄國文化的格局，直到 20-21 世紀之交才有人去考慮修正這種格局，即中國社會沒有因為翻譯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文本，就提升了認識俄國文學的水準，遠不及西方譯者和研究者關注到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是和俄羅斯文學文本一樣，皆充滿著民族主義訴求；²¹這種譯介的長時段後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國人的審美能力被扭曲、更遠離傳統審美。不僅如此，這樣譯介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不僅淹沒了許多重要的文學批評文本，包括學院派的許多經典、蘇聯時代許多僑民知識份子的文學批評和理論、後蘇聯不少具有原創性的文學批評，而且改變了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原本的結構及其意義。對這種漢譯的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與俄語的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不盡吻合的情形，其效應雖然吻合瓦爾特·本雅明《譯者的任務》（1923）所說的，在任何語言和語言創造中，除了可傳達的資訊和意義之外，尚有不可能交流的內容，根據其所出現的語境，可以是象徵其他事物的東西，也可以是被象徵的東西，這些導致譯文和原文是不可能一致的，但實質上更有漢譯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之潮流被整個譯介俄羅斯文本的洪流所攜裹的時代原因。諸如此類，使我們有必要重新認識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以及我們過去漢譯俄羅斯文學批評和理論的歷程。

²¹ See Ewa M. Thompson, *Imperial Knowledg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olonialism* (帝國知識：俄國文學與殖民主義)，Westport, CO: Greenwood Press, 2000.

參考書目

N.G. Chernyshevsky, *Selected Philosophical Essay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3.

劉寧。《俄國文學批評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陳永國主編。《翻譯與後現代性》。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車爾尼雪夫斯基著，周揚譯。《生活與美學》。大連：讀書出版社，1948。

《俄羅斯語言藝術：從語言藝術理論到文本結構（文選）》。莫斯科：Academia，1997。（俄文版）